

Jingyin qianbi jianshang yu shoucang

金银 钱币

本书涉及的金银钱币仅限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的金银钱币，
外国的金银钱币主要是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随着商业贸易流
入中国的金银钱币。

鉴赏与收藏

● 吴雄胜 蒋科 / 著



APE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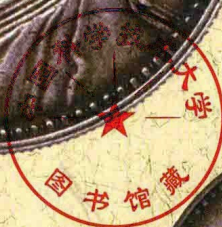
金银币

鉴赏与收藏



吴雄胜

蒋科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银钱币鉴赏与收藏 / 吴雄胜, 蒋科著.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37-6930-7

I. ①金… II. ①吴…②蒋… III. ①金币(考古)-鉴赏-中国②金币(考古)-收藏-中国③银币(考古)-鉴赏-中国④银币(考古)-收藏-中国 IV. ①K875.64②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1413 号

金银钱币鉴赏与收藏

吴雄胜 蒋科 著

出版人: 丁凌云 选题策划: 刘三珊 责任编辑: 杨都欣
责任校对: 刘凯 责任印制: 廖小青 封面设计: 王天然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http://www.ahstp.net>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 230071)
电话: (0551)63533323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51)6585917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5 字数: 252 千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7-6930-7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吴雄胜摄于上海

作者简介

吴雄胜,1956年2月生于上海,曾从事广告艺术设计和广告业务,先后担任安徽省广告公司业务经理、广告总监等职务。1997年被安徽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聘为评估部副主任,2001年分别被聘为安徽轻工业学校市场营销学教师和安徽商校商业美术教师。业余爱好研究中国历代钱币,集研有30年之久,公开发表的关于钱币论文及相关文章50余篇,现为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安徽省钱币学会理事、安徽省省直钱币学会秘书长。论文《对“金银见钱关子钞版”几点看法》发表在黄山书社出版的《东至关子钞版暨两宋纸币》论文集中,2009年应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邀请撰写“盛世收藏系列”《钱币鉴赏与收藏》一书,而后,相继撰写了《太平天国钱币鉴赏与收藏》《花钱鉴赏与收藏》等钱币专业书籍。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在2010年1月、2013年1月和2014年7月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及网络书店出版发行。2012年又应安徽钱币学会及安徽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参与《安徽历史货币》一书的审编,该书于2014年9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蒋科,1979年8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现担任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手机研发工程师。热爱古代文化艺术,痴迷集藏中国古币,藏品万余枚。2009年,应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之邀与吴雄胜老师合作编撰“盛世收藏系列”《钱币鉴赏与收藏》一书。并于2012年,再次与吴雄胜老师合作撰写《太平天国钱币鉴赏与收藏》《花钱鉴赏与收藏》。

前 言

蛇年的年初,在钱币大师马定祥之子马传德先生府上,马传德先生赠送我一本他最近撰写的《币海拾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在书中《献媚慈禧的大清金币》一文里,马传德先生写道:“近年来,中外钱币拍卖会上大清金币拍品时有出现,其中有些金币的币面达到了平光如镜的地步,事实上,在百年前,国内造币厂的铸造工艺是达不到‘镜面’这种水准的,望收藏者慎之。”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联想到《中国钱币》杂志2007年第1期孙浩先生一文写到: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载:“民国八年由天津学徒唐某雕刻的袁世凯飞龙钢模迄今未毁,不断铸造出金银币流入收藏市场……”。试想收藏市场上年年出现的“袁世凯飞龙金币”,究竟是民国铸造的,还是现今钱商铸造的呢?笔者也不敢妄言。

现今收藏界仿冒伪造文物的各种乱象,涉足古玩的朋友们都有体会。只要您涉足古玩圈内,就会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尤其会被古玩行内认可的名人字画或名窑中的瓷器等稀缺名品所迷惑,这其中当然包括古钱币中的金、银、铜等珍稀钱币。不法之徒深谙人性固有的贪恋本性,利用欺诈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会采用现代先进的高科技,比如电子三维扫描、精确的纹理刻工、制造铸模进行机械锻造,仿造出多种质量优等的赝品,逼真程度犹如真品。

为此,笔者在完成《钱币鉴赏与收藏》《太平天国钱币鉴赏与收藏》《花钱鉴赏与收藏》三本书后,再次提笔撰写《金银钱币鉴赏与收藏》,其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普及金银钱币鉴赏的基础知识,尽可能将自己多年来对金银钱币收藏鉴赏的常识与体会写进书中,让更多的钱币初涉者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及实物对照,尤其是通过了解古玩市场一般不易见到的部分古代及近代金银钱币,来提高读者辨别钱币真伪的能力。

本书涉及的金银钱币仅限于中国古代及近代的金银钱币,外国的金银钱币主要是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随着商业贸易流入中国的金银钱币。

为了确保书中金银钱币的真实可靠,书中所选择的币品,有的是上辈传给笔者的,有的是笔者早年的收藏品,还有相当部分是安徽各地市县博物馆及文物单位的出土藏品和人民银行钱币学会的藏品,这些均以原物彩色印刷提供给初涉钱币的爱好者去对照参考,但愿此书能对藏者在收藏过程中有所帮助,并有所收获。

吴雄胜

2014年12月22日



鉴赏与收藏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及近代金银钱币发展概况	1
一、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币发展概况	1
二、汉代金银币发展概况	5
三、唐宋时期金银币发展概况	7
四、元明时期金银币发展概况	11
五、清代金银币发展概况	13
六、民国时期金银币发展概况	17
第二章 金银货币	20
一、春秋战国的“郢爰”	20
二、春秋战国的“陈爰”	25
三、春秋战国的“鑍金”	26
四、春秋战国的“无文金钣”	28
五、汉代金银币	36
六、宋代金银币	44
七、元明时期金银币	52
八、清代金银币	58
九、民国时期金银币	130
第三章 外国银货币	162
第四章 与金银货币有关的物件	170
后记	176
参考文献	177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及近代金银钱币发展概况

一、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金银币发展概况

张杰博士在其所著的《天圆地方的困惑》一书曾言：“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与铜钱，前者与封建上层消费相契合，后者与小农经济相匹配，从而呈现贵金属货币与铜本位货币多重平行发展的历史现象”。说到金银币的使用，理应先从金与银的诞生开始说起，黄金自古就存在，如天然金块和沙金，《天工开物—五金黄金》记载：“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以枚举。山石中所出，大者名马蹄金，中者名橄榄金、带胯金，小者名瓜子金。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头金，小者名麸麦金、糠金。”这种金黄色的物质存在于自然界的河畔小溪沙砾之中。古人获取后，发现黄金较柔软，便于加工，而且加工过后的黄金光彩夺目，千年不腐永不退色，用来作装饰品非常合适。随着人类认知的不断提高，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银、铜、铁等矿物质先后被发现，相比之下，黄金柔弱的特质虽不能用作制造武器，也不能用作生产工具，但是黄金的稀有程度及金黄灿烂的神秘感，使古人将黄金与太阳联系在一起，从成都金沙三星堆出土的金饰“太阳神鸟”可证此推断。银的使用应该要晚于黄金，它不如黄金有着天然出产处，天然的纯银基本没有，发现的银矿都不是很纯，常与多种金属混合在一起，提炼溶解是件非常麻烦且不易的事，故黄金服务于人类比银要早。甘肃玉门火烧沟夏墓出土的一对金耳环，从它的造型以及粗糙程度可推断出，中国的黄金使用记录应该在 4000 多年前就已出现，甚至更早。

商、周时期，人类生产力进步，冶炼技术逐步成熟，金银的提炼水平大大提高了，产量日趋增加，这个时期金银需求仅限于帝王赏赐及贵族阶层用来当作装饰品，以及大量被用于青铜器皿的镶金、镶银和奢侈的生活之用上，真正用作货币等价物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技术的进步，地主阶层与商人阶层财富随之增加，他们发觉产品不是理想的保值工具，各种形状的青铜刀、布、铲、环、圆等货币在各国相互之间贸易流通时的作价又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而且并不是完全通行，因此也不是理想的货币、等价物。我国社会劳作自古就以农耕为主，农产品的特性，使它不能久存，影响资本的积累和运转，这时候就需要某种等价物来充当替代，唯有金银才能做到这一点。正如马克思《资本论》所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金银”。这是由金银的自然属性所决定，金银有久藏不腐等优点，正因为如此，一旦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那么金银自然就被人类作为货币、等价物使用。尤其是黄金更是被大众所认可，甚至利用黄金可以游说贿赂当时各国君臣。比如，战国末年，秦国为了称霸天下，战胜六国，首先采用强大的军事武力，其次利用黄金的诱惑，贿赂收买别国权臣，施以反间计。《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记载：“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



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魏王果然中计,罢撤了信陵君。于是秦国犹如蚕食桑叶一样逐渐地侵占魏国土地,十八年后便俘虏了魏国的国君魏王假,并屠杀了魏都大梁军民,公元前 225 年魏被秦灭;《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以“金千斤”予姚贾,以制止“山东四国”攻秦。可以说黄金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正式确立了黄金作为货币的地位。考古发现战国中期前,楚墓出土的黄金多为金饼,分为无文和有文两种,而无文的金饼和金块肯定早于有文的金饼出现,就此可推断我国铸造使用黄金货币的历史应该不会迟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商业较为发达,商人追逐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断发展的商业贸易需要货币支持,因此刺激了各国铸造大量不同形态的货币。春秋战国是各诸侯国竞相称霸的年代,各国的货币形态与发行并不受周王朝的制约,铸造形态随意。例如“耸肩尖足空首布”等币,据考:山西侯马东周城址有此类“空首布”和“铸钱范”出土,钱面铸有各类铭文及无文等大、中、小三种币品;“平肩弧裆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主要发现于河南洛阳地区,流通于周王畿周边,币种有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经研究这类币种是春秋晚期晋国的铸币;齐国铸有刀币,铭文为“齐法化、即墨法化、即墨之法化、齐返邦长法化”,统称为“齐大刀”;燕国也铸有尖足布和刀币,刀币形制首部有圆折和尖锐两类,铭文有“明”字,形状小于齐刀,统称为“小刀”,尖锐者称“尖首刀”,一般均简称为“燕明刀”;魏国先后铸有刀币及布币,刀身各异,刀头较尖,简称为“针首刀”,布币有“锐角布”、“方足布”、各种“新布圜钱”等;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流通货币量增多,各国货币的铸造由空首布演化至新布,这样省略了原先铸造空首布还须安装内范这道工序,新布的形制为首部平实、圆肩或平肩、底部圆裆、方足,钱文纪地、纪值,有半新、一新、二新三等;赵国与齐、燕、三晋、戎狄等国接壤,受各国经济与文化影响较深,所铸货币形态多种多样,有刀币、布币、圜钱等,刀币铭文有“甘丹、城白”等,刀身较直,简称“直刀”。布币有大小尖足布、大名鼎鼎的“圆足三孔布”就出于赵国,有纪值“两”和“十二朱”两种,因钱首与钱足左右有三个小圆孔而得名,还有圜钱、金饼等多种形态货币;韩国的货币铸造主要受到三晋经济圈的影响,铸币的形态有大型“锐角布”、小型“方足布”和部分“圜钱”等;秦国在统一六国前,各国的货币都有流通,可能铸有圜钱。半两钱种最初通行于四川、陕西一带,它并不是秦国早先的货币,而是秦一统六国后,颁布的统一法定货币“半两”;楚国也是货币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铸有郢爰(金质)、布币、蚁鼻币,布币的铭文为“殊布当新背十货”此币在战国的布币系列中形状较大,简称“楚大布”,蚁鼻币铭文较多,有“行、金、君、忻、甸”等多种。金币“郢爰”的出现适应了当时的市场规律,它在市场流通中被普遍认可,尤其是七国中的楚国是黄金盛行地区,考古还发现早在春秋晚期楚国就已经开始铸造各类形状 of 无文和有文(郢爰)金币,郢爰也是我国最早凿有文字的黄金法定货币,在楚国铜贝流通区内可能相当于秦国的十六两,在布币流通的三晋、两周地区可能相当于秦国的二十两;在刀币流通的齐国、燕国及赵国可能相当于秦国的二十四两。金币郢爰可以说在中华民族货币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颇有影响。



根据此种金币的币面文字可译读为“郢爰”，郢为楚国前期国都。据记载，公元前689年熊贲即位，始都于郢（今湖北江陵县）。昭王十二年（公元前504年）因避吴患，北迁徙都至都（今湖北宜城东南）。惠王即位之初，曾迁至鄢，后又迁回郢，在郢定都的时间最长。之后，楚国因受西北秦国的不断威胁，国都一再东迁，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从湖北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年）又迁到钜阳（今安徽太和县），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再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在这不断东迁的时期内，按楚人的习俗，不管迁都何处，楚国的国都仍用“郢”的名称，因此，金币“郢爰”理应为楚国的国名而铸。直到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所灭而终。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郢爰”出土于安徽寿县等地，说明当时楚国是黄金货币交易大国和黄金货币生产国。《管子·国蓄》载：“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战国策·楚策》载：“黄金、珠玢、犀象出于楚”；《史记·货殖列传》载：“豫章（今江西南昌）出黄金”；《诗·鲁颂·泮水》有所谓“南金”；《中国货币史》载：“当时的楚国有许多产金区，例如汝、汉就是以产黄金而闻名”。这就是楚国黄金产地，其造就了楚国铸造金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楚国铸造出的金币形状可分圆饼、方块、瓦楞和龟背形四类，其中方块形有长短之差，极不规则，从这类形制的楚“郢爰”金来看，龟版（背）形金币占绝大多数，也是多种形制中最为成熟的一种，完整的龟版形金币边角上翘，整块凹弧，仿龟壳意图明显，这也反映了楚人有“货币而宝龟”的习俗，同时又体现了楚人崇龟的浓厚意识。

楚国这种黄金货币不是单个，而是大小块状、厚薄、种类均不等的货币，币面铃盖多种称谓的币文，例如“郢爰、陈爰、鄢爰、颖爰、邲爰、卢金”等，其中以郢爰、陈爰为主，尤以郢爰最为多见，币背素面无文，有的刻有几道条或多道条横竖杠，有学者认为是黄金的编号或符号等，我以为不是很确切，可以说没有实际意义，也很可能是古人裁剪金块时遗留的裁剪痕迹。

币面上铃盖的文字戳子有方形与圆形两种：“郢爰、陈爰”等为方戳，“鑪（卢）金”为圆戳，“爰”字前的一个币文，如“郢”“陈”等，指的是地名，“郢”指的是今安徽寿县或湖北江陵；“陈”指的是今河南淮阳县；“鄢爰”的“鄢”指的是今山东兖州，春秋时期属鲁国，战国时期楚考烈王七年（公元前256年）鲁国被楚国所灭，鄢并归楚地；“鑪（卢）金”指的是今安徽庐江西舒城县境内或湖北襄樊市西南，古称卢戎国，公元前699年被楚国所灭，卢金并归楚地；“颖爰”的“颖”指的是今安徽颍州，即阜阳；“邲”可能是指今河南省南阳市西北。

“郢爰”亦可称“郢禹”，又名“印子金”，印子金是因块状金版上凿铸有方形或圆形的戳子而得名，《中国货币史》作者彭信威先生认为：“印子金最早为宋代人所提”。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有“印子金”一词；《我国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王毓铨提出战国时期楚国黄金货币的称呼应该为“爰金”。“爰”是重量单位，在金版中则充当货币专名。但是战国时期只有两种重量单位，即斤（铢）和鎰，一斤为十六两；一鎰为二十两，楚制一斤就制定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爰金”的称呼较为确切。

楚国“爰金”金版在实际流通当中是要凿开使用的，每块金版上的铃盖小印数不

等,完整的一方大约在 250 克,按照现今的计量单位为半斤。爰金有的一小块,有的两小块,有的数块,有的连在一起残缺不全,就是完整的一方,也会因金版厚薄不同有重量之差,所以流通时根据货物价值多少,可以将金块凿开,经过等臂天平秤称量支付。银质货币史籍未有过多的记载,据《文物》杂志 1980 年第 10 期记载,在 1974 年 8 月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了一批大小及重量不等的楚银“实首布”和一枚“空首布”;《文物》杂志 1981 年第 2 期载,1974 年在原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遗址发掘出银质贝币四枚。这两次出土也是我国最早银质贝币发现的记录,至于如何作价流通,书籍无从查找。《文物》杂志 1966 年第 5 期记载,湖北江陵三座楚墓中出土大批重要文物,其中就有银饼;另外在《中国货币纲要》一书也提到了齐国有银刀。

但是,古代的“黄金”一词称谓分黄、白、赤三种。《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载,司马迁记载:“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就是黄金,白就是白银,赤就是青铜。所以古代书籍说到的“金”不完全指的真正黄金货币,它具有不同的意义,包括银和青铜铸就的钱币或饰品、器皿等。所以我们在研究古代金银使用流通时,一定要细细琢磨区分古籍书内所记载的这些涉及“金”的称谓文字。例如: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所铸刻的“赐金”“罚金”“贡金”“俘金”,这个“金”指的就是青铜;西周的周幽王为了博得褒姒一笑,下令不论是谁,只要能让褒姒一笑即赏赐黄金千两,此“金”即为青铜钱;西晋武帝司马炎之女婿王济,此人生活十分奢侈,挥金如土,平生爱马成癖,为建马厩之墙竟用钱编成辅地,人称“金沟”。此金沟即为“青铜沟”,而非真正的黄金沟;春秋时期,秦穆公遍告十七国诸侯,要各国派公子前来临潼聚会,想借此聚会将各国公子扣作人质,意图霸主地位。楚平王不敢怠慢,让公子半建前往,并让国相伍奢的次子伍员随行。伍员才华盖世,凭着过人的胆识与秦国君臣周旋,令秦穆公刮目相看,赐伍员“白金”宝剑。这里的“白金”即为白银;《七国考引·山东志》记载,在公元前 301 至前 284 年,齐湣王迎娶宿瘤的聘金一百镒,此金即为黄金;《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商鞅曾以赏金制度来为政府建立威信,“徙木为信”的故事就有赏金十金和五十金的记载,此“金”所指就是黄金;《战国策·燕策三》记载,燕国太子丹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于是将此匕首淬以毒液,由荆轲携此匕首行刺秦始皇,后被御医夏无且救助,被秦王嬴政赏赐黄金二百镒。这里所指的“百金与赏赐黄金”就是黄金。按当时一镒为二十两来算,二百镒等于四千两。但是有学者认为:“春秋以前所指的‘金’均为铜,春秋以后所指的‘金’均为黄金”,笔者以为还要细细琢磨,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唐代、汉代的文献中就有很多处记载有称值若干金,此处的“金”往往不是指黄金,而是指铜钱。比如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推行币制改革时,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其中的“金钱”指的并不是黄金而是铜钱;《汉书·张汤传》记载,酷吏张汤在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 116 年 12 月)因遭诬陷,被打入大狱,后自杀,死后清查,其“家产不过五百金,皆所在,得奉赐,无它赢”。这里的“金”,笔者以为就是“量词”,也就是一金相当于万枚钱,指的是铜钱,因汉时一金为一万枚铜钱;又如《四川通志》载,明代在四川丛林伐一根直径一米左右的楠木,需要人工等费用“七八金”。这里的“金”也不是指黄金,而是铜钱,如按明代物价折合成白银大约一两。故此,我们在阅读文献时要加以区分金与青铜二者关系,不能被混淆



视听!

公元前 221 年,秦国以强大的军事武力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将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更名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阳;确定统一度量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筑长城、修驰道等。货币流通政策并不是先前所然:“秦统一六国后,货币即归统一”,而是布告于天下,废除了原先六国在市场流通中出现的各种纷乱的贝、刀、布、铲、环等币种。以先秦的圆形方孔“半两”钱,逐步取代得以统一,黄金货币继续使用,至于何种形态,史籍未见详载,估计类似楚金。《天圆地方的困惑》记载:“考古发现,秦国的金饼一斤与楚国法马的每斤平均值相当,合 250 克左右。”但是没有注明发现金饼的形状与地点。笔者以为秦在当时应该有他自铸的黄金货币。中国的币制,从秦统一后,就以秦楚二国原有的币制加以融合延续。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一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说明当时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黄金之所以为上币,除了商贸之用,主要还是为了适应上层统治阶层的需要,比如帝王的宫廷赏赐、馈赠、贵重商品大额支付等,《史记·赵括传》记载:“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说明赏赐的黄金在当时既可以当财宝储藏,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用于买卖田宅。所谓下币,也就是秦时“半两”。“半两”钱重量为秦时的半两,即十二铢。上古以十黍为一柰,十柰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说苑·辨物》更为通俗:“十六黍为一豆,六豆为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当时一斤约 250 克,为十六两。一两约 15 克,一铢约 0.63 克。秦“一两”圜钱,重 14~15 克,钱重合乎法定重量。“铢”“两”也是秦时的重量单位,“秦半两”是重量名称。中国钱币以重量为单位,就此一直延续到了唐代。

金银币的使用在秦时民间并不是很普遍,遗存秦国时期的货币很少发现有法定文字注明纯金银实物,出土更为罕见。估计当时贸易,大额支付为黄金,小额应该是秦半两,金的来源还是继续出自原来的楚国地区或遗留的“爰金”。1979 年,湖北云梦县城关西部的睡虎地发掘二十五号秦墓时,在诸多的出土器物中有秦半两伴有楚币,其中就有“郢爰及蚁鼻钱”,此例出土可证秦始皇在统一市场货币的过渡过程当中“黄金以一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之记载。

二、汉代金银币发展概况

汉代的币制基本延续秦制,大数用黄金,少数用“半两”。黄金改以斤为单位,一斤黄金作价等于一万个铜钱。黄金形式多少受到楚国爰金块状的影响,在铸制形式上改变了龟状,同时又沿袭了战国马蹄形状,也称“襁蹄”形金币,据辞海解译《汉书·武帝纪》载:“今更黄金为麟趾襁蹄,以协瑞焉。”颜师古注:“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耳。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说明此金币形状酷似马的蹄子,金的成色纯正,中心空洞,底部椭圆形稍微凹进,也称“麟趾金”。每枚重为汉制的 1 斤(250 克左右),有的金面刻有记重文字,如“斤六

铢”“十五两廿二铢”等。民间又称其为“马蹄金”；还有的铸成了圆形饼形，俨然如柿子饼一块，故称其为“柿子金”或“金饼”，此类黄金当时主要用来赏赐那些效忠于皇室、有军功的大臣及士卒。

白银在汉代逐渐在货币流通中使用，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币制的时候，颁布过白银只能作为器饰宝藏，不作货币使用的法令，汉继承秦制，最初也未用白银当作货币，但到了汉武帝时候，白银不但用作货币，而且还是铸币。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打击富商大贾，没收诸侯巨额财富，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采用白金和皮币。所谓白金，是一种银锡合金，铸有三种面额的钱币，据《史记·平准书》记载：“造银锡为白金，以天下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值）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值）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值）三百。”“皮币是用白鹿皮，每张一方尺，值四十万。”这种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与鹿皮两种货币是对当时流通的四铢半两作的价，是一种巨额虚币，尤其是“白金三品”。据现代仪器化验分析，这种所谓的银锡混合的金属货币含银量极低，一般只含有5%左右的银，绝大部分是铅、锡成分，由于白金货币的严重不实，违背了货币经济规律，在实际流通中受阻，其结局是“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不得不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铸行后的第2年终止了“白金三品”的流通使命。

汉代盛行黄金，但是它又不像“爱金”作为名正言顺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它的表现首先在帝王赏赐上，以西汉为例，赏赐便有定期、庆典、功勋三大类别，如《汉书》就记载过，西汉宣帝时的名臣疏广与他侄子疏受深受宣帝宠信，他们知道的事业和命运在顶峰时应该激流勇退，故假装生病，上书宣帝请求退休。宣帝准后并赐黄金20斤，皇太子也赠送其黄金50斤。另在1982年，江苏盱眙马湖店村在开挖水渠时，有一万姓农民，挖到一只金兽和一把铜壶，铜壶内有9块半金饼和15枚马蹄金。据考，这批财宝均为西汉之物。此两段实例，足以说明统治阶层的用金之风在当时极为盛行。因此在《中国货币史》中彭信威先生统计说：“仅黄金就有899530斤有奇，加上东汉的21740斤，共计90余万斤”；其次表现在税捐上，即酎金的征收，所谓的酎金，就是诸侯们按他们管辖区域的人数每千人进奉黄金四两，如金少或成色不好，王则削县，侯则免国；第三表现在赎罪费上；第四表现在贿赂上。这些都说明黄金在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通货币，当然作为贮藏手段也是黄金的一种通行职能。

到了王莽掌权的时候，政府把黄金国有化，禁止侯爵以下持有黄金，民间的黄金都要卖给政府。王莽为什么要把黄金集中到国库，是贪财还是防止黄金外流？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汉末，国库空虚，财源严重枯竭，黄金数量的急剧减少是事实，为何缘故？学术界各抒己见，大致归纳为：连年对匈奴战争支出的黄金；帝王、贵族奢靡的用金；丧葬所用丰厚的金器皿陪葬；佛教兴起，用于庙堂、佛像等贴金、大量泥金写经；派遣张骞开拓西域之路，对外商贸的黄金开销支付等。

王莽的币制改革中，黄金以斤为单位，白银以半斤为单位，白银和黄金具有同样的地位，形制和汉金差不多，均为圆形，称其为“银饼”；还有如船形与条形的白银一般称之为“银铤”，船形为两端翘起，底部平易，币面部刻有币文等。总之，在东汉时

期,白银出现在文献中的次数较多,如帝王的赏赐或储存都有金银并提的例子,如《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的财产中就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商品经济相对滞后,钱币铸造发行也很复杂,不是面额虚值的大钱,就是减重的小钱,青铜钱币的铸造量相对少些,贵金属金银铸成饼、铤以及圆型钱。据《中国货币史》载:金钱最早的记载是南朝齐梁间吕僧珍生子时,宋季雅送金钱一千枚。银钱最早的记载是在宋代元嘉年间翻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中所记五百弟子各以银钱一枚送给善慧的事;但是现存最早的方孔银钱实物要算钱币大师马定祥珍藏的大型秦半两。

三、唐宋时期金银币发展概况

唐代初,仍承袭旧制,流通货币以钱帛为主,黄金作为财富被储藏,而不是十足的货币,它们的货币属性还比不上绢帛。在购买商品时必须先将金银变卖成铜钱,然后才能支付使用。估计金钱一枚等于银钱十枚,银钱一枚等于铜钱十枚。金银在唐代某些情况下也发挥过次要的货币职能,如作为支付赋税、捐献、赏赐、军政开支、贿赂、谢礼、悬赏、赌博等方面作用。尤其是赏赐行为在唐代大为盛行,宫廷不但打制大量的金银器皿,还铸有大量的铜镏金“开元通宝”以及纯黄金方孔圆钱用来赏赐,如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邠王府窖藏中的金质开元通宝;唐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内廷嫔妃,每到春天,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旧唐书》记载:“己卯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争拾之”;《资治通鉴》记载:“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译文大意为:安禄山生日,唐太宗和杨贵妃赏赐安禄山许多衣服、珍宝及食物。三天后,又把安禄山召进宫中,杨贵妃用锦绣做成的大襁褓裹住安禄山,用彩轿抬着喜闹,声称杨贵妃为儿子安禄山洗身三天。唐太宗观后,高兴之余就赏赐给杨贵妃洗儿金银钱,又重赏安禄山,尽欢而散。这两段记载中“掷金钱为戏与洗儿金银钱”,均指的是纯黄金方孔圆钱和小平镏金开元通宝方孔圆钱。而白银的使用也逐渐推广开来。如支付回纥的马钱,馈赠给外国使者等的赏赐均使用白银。《南史》卷五三《武陵王纪传》载:“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簠,至有百簠;银五倍之。”由1958年1月22日从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现实实物与唐代的金银结合来看,唐代有“铤”也有“饼”,有的铤、饼上铸有“元和八年”“来安”等文字。2007年《中国钱币》杂志第3期金德平先生在“唐代银饼考”一文中提到:1970年10月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的考古发现,为20世纪唐代考古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其中唐代货币就有:银饼22块,其中小型银饼10块,大型银饼12块,大的银饼重量均在445克左右,小的银饼重量均在90克左右;《中国货币史》载:“唐末和五代,白银的使用更加普遍,岭南一带,金银通行。唐代韩愈说过“五岭买卖皆以银”的话,元稹也说过“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的话。当然金银作为货币不但参与国内商贸流通,在对波斯、日本等许多国家进行贸易时,也多有使用,到了唐末几乎处处用白银,五代时期白银的重要性已经超过汉代的黄金。

宋代的币制,仍是以铜钱为主,白银开始流通。黄金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基本消耗



殆尽,产量日少,价值日渐贵重。白银在唐、宋时期开采较多,在民间自然而然就担当起货币的职能,尤其在宋代。它不但具备黄金所拥有的各种职能,而且每一种职能都比黄金运用得更为广泛。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商税、盐茶税、帝王的赏赐,常常是金银并用,而白银的使用次数更多。例如公元1004年辽与北宋之间发生战争,宋真宗赵恒惧怕战争,于是在公元1005年元月与辽订立和约,协定辽不再侵犯宋国,但是宋国每年要有十万两白银作为岁币及二十万匹绢进贡给辽,由此便换回了宋辽两国一百余年的和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又如北宋嘉祐七年(公元1092年)宋仁宗在一次南郊大礼的赏赐中,用银就高达35493两;《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一〇记载:“乾道元年二月十日,枢密都承旨张说言:广西邕州横山寨马每匹价值大约用银四五十两,而全纲善达者十无二三……”。金银用于民间的田宅交往,例如《宋史》卷二七四《田钦祚传》记载:“太平兴国中,太宗赐田钦祚白金五千两,令市宅。……”;《宋史》卷二九七《郭进传》记载:“宋仁宗时,郭劝年七十,乞致仕,三上不得谢,赐银使市田宅”;《长编》卷一二〇记载:“景祐四年三月丙申内出章惠太后阁金千余两,市庄园邸舍,以给万寿观。建广爱殿,奉安章惠御容故也”;《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壬辰载:“和安大夫、开州团练使致仕王继先尝以黄金三百两,以故密阁修撰赵明诚家市古器……”;《金瓶梅》第一回(西门庆热结是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载:“武二郎听老婆这般说,当下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金银用于一般交易,如《东坡尺牍》记载有苏东坡一段生活随记:“与参寥书,以银二两,托购茶果,莫辩才;与范元长书,以银五两,为秦少游斋僧”;苏轼《东坡续集》卷五《书简·与范子丰六首之六》记载:“……纳银一笏,托用买圆熟珠子二千枚,少钱告那,出便纳上。婚嫁所须,无可奈何,甚非情愿”;金银用于官民间的交易的例子有《长编》卷五二记载:“咸平五年八月戊子,度支请增榷场院入中金价,上曰:‘国家所急者军储,金非切要之物。’罢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一八《与庙堂乞筑城札子》载:“本军有买名银一万七千馀两,隶在常平,稽之专条,不可擅用”;《宋史》卷四六《度宗纪》记载:“咸淳七年四月辛亥,免广东提举司盐筭银三万两”;金银用于民间婚配聘礼的例子有:吴自牧《梦粱录》卷二〇记载:“嫁娶聘礼……亦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这些记载均说明金银在宋代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参与社会经济流通及通兑的地位早已深入人心。宋代是比较富庶的社会,经济相当发达,工商业的繁荣景象我们在《清明上河图》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自然很大,大众交易都以铜钱、铁钱为主,日常收入根据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记载:“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约是100文,上焉者或达300文,而北宋的单日最低生活费约为20文,算下来,一个5口之家,只要有2个有收入之劳力,刨除必要的开支,每月还能节余3贯即3000钱。”白银一般支付较为大额的商品交易。据《宋书》与《清锁诗话》记载,北宋宰相寇准在宴请时的一些开销,其中就有夜晚照明用的蜡烛,每根约300文。在宋代2000枚铜钱相当于一两白银。铁钱二至十枚对换一枚铜钱,北宋以小平铜钱流通,南宋以折二铜钱与铁钱为主,小平钱较少,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的钱币换算也不一样。一般均为1000枚为一贯,但是宋代有700、800枚或850枚为一贯的,也有480枚为一贯的,根据史籍“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

记载,就以当时 2000 个铜钱折银一两换算,米价是 1 石为 300~600 钱,1 两白银基本上可以买到 6 石左右大米(一石为 120 斤)。由此可见白银在宋代通兑地位之高。为此,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转运使张洎建议政府准许民间用银绢代替铜钱纳税,因官吏俸禄、军饷及国内外的商贸往来也使用白银交易。

南宋初期,据《宋会要辑·食货》二六之一二记载:“绍兴二年九月十六日,知滕州侯彭老言:本州卖盐宽剩钱一万贯文省,买到金一百六十两、银一千八百两投进……降一官放罢”;南宋后期,据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二八《奏乞增支督府钱物》记载:“端平二年,魏了翁奉命开督府,朝廷拨给督府钱财中有金两千两,约计官会十六万贯”;秦九韶《数书九章·均货推本》(一)载:“金每两四百八十贯文。”《数书九章·均货物价》(二)载:“八分金两价四百贯。”《数书九章·炼金计直》(三)载:“问:库有三色金,共五千两,内八分金一千二百五十两,两价四百贯文;七分五厘金一千六百两,两价三百七十五贯文;八五厘金二千一百五十两,两价四百二十五贯文;并欲炼为足色。每两工食药炭钱三贯文,耗金九百七十二两五钱。欲知色分及两价各几何?答曰:色一十分,两价五百三贯七百二十四文五百三十七分文之二百一十二”。

宋代金银的形式各种各样。可以参与流通的“铤”也可叫“笏”或“版”。“笏”为清朝以前大臣上朝时用的“朝版”或叫“朝笏”,为什么此笏作为白银称谓在宋代的有些文献中有所体现?笔者以为这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们根据史籍记载而判断。如《江苏历代货币史》记载:丹徒县丁卯桥出土不少笏形银链,笏的单个长 36.2 厘米、宽 7.6 厘米、厚 0.6 厘米、单重 2 050~2 060 克。银铤还称“錠”。錠、铤二字发音相近。由此,铤字在民间口语中逐渐转为錠字,并被民间接纳习用。錠的形状为两端呈弧状束腰,錠面斩刻有地名、用途、重量、官吏、匠人名字等。大铤重五十两,中铤重二十五两、小铤重量不等,有十二两、七两、三两等;黄金铤只有小铤,形状为长条形,手工打制,重量在 39 克左右。金银还有“圆、饼、牌”。圆的形制类似方孔铜钱,饼形不多,牌比较小,呈长方形,据存世与出土文物考证,金牌的重量一般在 4 克,可能属于宋时常见的流通黄金,据宋人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记载:“李园者以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土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李得之,遂转而货易……”此段记载说明小金牌在当时作为黄金流通中的普遍性;又如《云仙杂记》卷五《金牌盈座》记载:“河间王夜饮,妓女讴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说明金牌、金铤除了赏赐和贮藏外,还具备民间用作货币流通之用。金银方孔钱据文献记载,在宋时有着较大的铸造量,宋代也是历史上使用金银最多的朝代。它主要流通于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当中,如“宣和年间金人攻入汴京在宫中发现金钱七十一贯,银钱一百四十二贯”。在使用方面,《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宣和六年(公元 1124 年)正月十四夜,上元灯节,在宫城宣德门上“交撒下金钱、银钱,与百姓抢金钱”之举,以示太平景象;《张氏可书》记载:“道君(宋徽宗)既逊位,乘轻兴出东水门,自税舟……见卖蒸饼者,于筐夹中取金钱十文,市一枚以食”。这类金币行用时间基本集中于北宋末年至南宋。如北宋末年有“政和通宝”“宣和通宝”等。此类金币 1966 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之中均有出土。靖康年间也铸有银钱存世,南宋有“隆兴通宝”金币,据载 1986 年出土于浙江慈溪;“乾道元宝”金币 1936 年出土于杭州古荡,上海博物馆钱币馆就藏有此金



币：“太平通宝”金币出自于杭州等不少地方，此种金币两宋均有铸造；“淳化元宝”金币 1988 年出土于佛教圣地五台山，同时也有祝寿用的金银方孔圆钱，大小一般从如小平钱，钱文有“福宁万寿、寿慈万寿、绍定万岁”等；方孔金钱在民间也有使用，《东京梦华录》卷五《娶妇》载：“新婚夫妇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及采果散抛，谓之撒帐”；另有“马蹄金”“瓜子金”“沙金”“橄榄金”“麸子金”“膀子金”“叶子金”等；由于金银的广泛使用，京城临安金银铺出现十分繁荣的景象。这些金银店铺平日竞争非常激烈，为表示信誉，一般金银铺店多在自家销铸的金银铤上打上金银铺的地名、街道名与匠名，表示对金银铤成色的负责，在流通中可以随时查验。然而黄金在宋代并没有被官方设定为法定流通货币，但是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经承认了其货币职能，例如《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广马》，记载了绍兴七年广西马匹价格的情况，其中提到要买一匹优良的马驹需要支付黄金二十两；其次黄金用于纳税的功能在北宋就已经存在，到了南宋时较常见，从遗存金牌、金铤中就有印戳钤击“出门税”与“出门金”等文字可以考证；黄金还用于军费，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也记载有：如绍兴三年，“授汤东野兵千人以行，赐米六千斛，黄金二百两，白金三千两，为养兵之用”；又如绍兴三十一年庚午，“刘锜捷奏至，高宗遂遣使以金五百两、银七万两偏劳有功将士”；又如端平二年，“诏两督府各给金千两、银五万两、度牒千、缗钱五百万，为随军资”；黄金在当时主要用于上供，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建炎三年八月乙巳条记载：“诏诸路催钱粮，赴建康府户部送纳，其金帛并赴行在”；又有如绍兴三年八月戊申条记载：“罢江浙等路转运司。给事中黄唐传言：自置司以来，催发上供所增钱三十余万缗，黄金千五百余两，米二十二万斛，绢二十余万匹，绵亦称是，不知何名而遽罢之”；黄金用于进献、赏赐也是常有的事，如，《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记载：建炎二年的一次郊赏文武百官中就用金三百七十两；又如《宋史·汤思退传》记载：“秦桧病笃，招参知政事董德元及汤思退至卧内，属以后事，各赠黄金千两。”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一《因谗赐金》记载：张浚受贬之后一贫如洗，但仍忠君忧国，高宗悉知后遣使赐金三百两。还有宋臣洪皓于南宋初出使金国多年，饱受苦痛，返宋后也得赐黄金三百两。再有绍兴十一年，胡世将受命出任川陕宣抚使，得赐黄金二百两。又如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下记载南宋朝廷对官吏的赏赐：“例赐牌子金百两”。南北宋时期使用金银实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这说明金银虽然官方没有明确在流通中能起到的货币职能，但是它在官僚系统以及民间的货币地位中却至关重要。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建国的年代和南宋相近，于公元 1125 年灭辽，于公元 1127 灭了北宋，因此强盛一时。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受宋影响较深。金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但是他们铸造的货币都使用的是汉文。其参与市场流通的货币基本采用纸币，入主中原后就在开封设交钞库，发行大钞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小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元，与辽、宋货币并行。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原因，金政府对交钞过度发行，而使其丧失货币价值，民间拒用，商人罢市，金交钞一度贬值，上涨了四十多万倍。金朝末年，白银与金交钞的比价，已到了六千万倍。相比而言，白银在市场交流中更加受到青睐，据载，金入主中原三十年间，也曾铸有五十两



银铤,形状与宋银铤类似,多作束腰形,铤面也斩刻有作坊、地名、重量、检验官戳、匠人名字等款识。使用以铤为计算单位,每铤银价折百贯铜钱。按当时一两白银合铜钱二贯估算,一铤五十两可买十匹马。金对黄金的使用与宋极为相似,有传世“金女陵钱”,此钱正背有篆体四字,正面左右为挽双发髻的妇女,钱背左右为头戴雉尾冠的演员,均广袖束腰,翩翩起舞,钱肉上刻有“金和元年、金人爱女”八字阴文。按历代纪元中无金和年号,据孙仲汇先生分析,应该是指金代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此钱专为纪念亡女而铸,用于殉葬。另有“承安宝货”银铸币,也是铤形,有一两、一两半、二两半、五两、十两。发行承安宝货是金章宗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危机而推行新的币制改革,即把原来铸造的每铤五十两银铤,改铸成面值为一两至十两的承安宝货新银铤,银铤每两折铜钱二贯。并在银铤上表明币值,分为五等,就此起到了取代碎银,筹措军费的作用,成为投入流通市场的银铸币。它与原来的白银称量货币有本质的区别,是白银货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变革。同时,承安宝货银铤也是开创了银铸币具有规定的形式、重量和价值面额的货币,它在我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元明时期金银币发展概况

公元1206年春,成吉思汗被推为大汗,建立了大蒙古国,铸有“成吉思汗”金币,其字面意思有“汗中之汗、最伟大、最公正”之意。此种金币未见流通,据说还有骑马持刀人像图纹银币,这两种金银币应是用于战争初期赏赐有军功的士卒。成吉思汗去世后,元世祖忽必烈率领蒙古族人先后征服金、西夏、南宋和亚欧许多国家,在开平(今内蒙古北)即汗位,建元中统,开始按中国汉族传统的王朝年号纪年。公元1271年,改“大蒙古”国号为元,公元1272年迁都元大都(今北京)。随后举兵南下,直至公元1276年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元王朝。

元代建立对中国币制带来了根本的变化。其采用白银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并且逐渐发展到用白银交易作为流通手段。从此,真正意义上将白银作为货币。

元代货币分上币与下币,金银为上,铜铁为下,中间还夹着宝钞。但是市场最初以纸币为本位,代表主要流通货币,政府也曾对金银采取过多次禁止流通和民间之间买卖的管理措施,但是元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就已经使用白银进行交易,这种长期形成的习惯难以被政府所束缚,因此,市场货币流通仍然以白银最受欢迎,并逐步成为主流。政府于是将大小不一的白银规范统一,也是为了防范有些官吏牟利贪污。铸造有规定形状、重量为五十两一铤的白银。《元史·杨湜传》载:至元三年“以湜为诸路交钞都提举,上钞法便宜事,谓:‘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有偷滥之弊,请以五十两铸为铤,文以元宝’用之便。”从此,银铤便以“元宝”之名称呼开了。忽必烈率领蒙古兵四处征战,除了征服广大区域外,便是抢劫财物占为己有。丞相伯颜看了心中不悦,在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南宋被灭,士卒凯旋回到了扬州,丞相伯颜便下令搜检将士的行囊,将他们一路作战中掳抢、豪夺的金银财宝统统收缴上来,将大量的金银集中销毁铸成铤,铤面铸有扬州等文字,每铤重约五十两,并在铤背铸刻“元宝”阴文二字,称其银铤为“扬州元宝”。“元宝”即为“元朝之宝”之意,又彰显大元帝国之豪